

往事如昨



一张老照片和她的芳华

王丹星

这是我人生第一张照片，拍摄于1956年仲夏，那年我4岁。照片右边是我的邻居王淑香阿姨，那年她二十多岁。由于年代久远，这张一寸的黑白照片已泛黄，掉边缺角，有好多折皱。照片虽小，但背后却牵着我与她，珍藏着我心中的王淑香阿姨一生的芳华。

我出生地位于现毓璜顶北路东侧，烟台中心大酒店（原来的劳动大厦）附近。当时好像还没有毓璜顶北路，西边不远的烟台市消防队的营房，大名鼎鼎的南大街与海港路，呈丁字形横亘在胡同北面。

我家住的胡同呈南北走向，是条半截子胡同，从北头进去，曲里拐弯走二三百米的样子，便是小蓬莱山体。为防止山体滑坡和碎石滚落，人们沿山根修了一道石头矮墙。胡同很窄，泥道，下雨天道路泥泞。胡同的名字我记不得了，但记得大人们通常管这儿叫马连（家）莹。从胡同南头的矮墙往小蓬莱上望，山半腰处，隐约可见一些坟茔散落于树草中间。

胡同两边是一个个院落，一个院子通常住二到四家。我们院子住二家。我家住的北屋，而南屋则是王淑香阿姨一家。

我是家中第一个孩子，每天起床第一件事，姥姥就是给我漱洗，梳小辫子，扎上红头绳或蝴蝶结。院子靠近胡同口，干完家务活，天好时姥姥会抱着我坐在胡同口。前边是南大街，姥姥一边憩息，一边看街上的光景。邻居们看到我俩，总要和姥姥说一会儿话，无非是夸她的外孙女长得如何精神，眉眼如何好看，进而夸姥姥会伺理打扮孩子。一些不认识的路人，见了我也会停下脚步，啧啧称赞我几句。姥姥会用“是吗”“漂亮什么”之类的话来客气一下，但满是皱纹的脸早已乐成了一朵朵菊花瓣儿。

那时王淑香阿姨刚参加工作。下班后，看见姥姥和我，她会弯下腰，一边拍拍衣兜，一边对我说：“叫姨！”我知道那是糖，马上乖乖地叫：“姨！”有个电影演员叫上官云珠，王淑香阿姨说我长得像她，还说长大了能演电影，笃定能成为女明星。她这一预言，只说对了那么一丢丢。1966年，八一电影厂的确到烟台二中挑选过演员，我是学校唯一有幸被他们挑选的女孩，但他们撂下一句让我“等消息”的话便走了，此后便没有了下文。

说实话，人们对孩子的夸奖，主要还是冲着大人去的。王淑香阿姨和我母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，程度堪比现在的闺蜜。当时我母亲还不到30岁，王淑香阿姨比我母亲小几岁，我母亲身高1.72米，是那一带有名的大美女，有“胡同西施”的美誉。而王淑香阿姨虽看起来稍逊色于母亲，但她也是大高个，皮肤亦白，俗话说“一白遮百丑”。那时候的女孩，即便长得再靓，身上很少有娇气，母亲和王淑香阿姨泥水也能下，都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。那时王淑香阿姨还没有结婚，常常看见她和母亲在一起窃窃私语，两个人总有说不完的话。说到兴奋时，还会情不自禁地吃吃笑起来。

王淑香阿姨叫我姥姥大娘，她很愿听姥姥讲故事，姥姥会说话，一样的话从姥姥嘴里讲出来，好听，味道不一样。我清晰地记得她坐在胡同口那棵梧桐树下，手托微微上扬的下巴，依偎在姥姥身旁，阳光透过树的缝隙洒在她年轻的脸上，好一幅温馨浪漫的油画。

王淑香阿姨是她家里唯一的孩子，父母对她十分疼爱。她是在无忧无虑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，穿的衣服一色都是在商店里买现成的，式样现在想起来也很潮，这一点在当时是件很牛的事情。爱美是所有女人的天性，她家外边的门上头镶有两页玻

璃。早上，当姥姥忙活我起床时，总会看到她在门外站着，对着玻璃里的自己，整理那两条大辫子，来回回端详自己，直到满意为止。

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，她坐着马扎，在梧桐树下听姥姥说故事。百无聊赖的她突然对姥姥提议：“大娘，我领小星去照张相吧，留着将来当个纪念。这么漂亮的小姑娘，不留张相片可惜了。”那天，姥姥给我穿了一件白色小碎花短袖连衣裙，袖为带花边的卡袖，王淑香阿姨穿的也是一件短袖连衣裙，同样为卡袖，只不过我的连衣裙色白，她的衣服颜色要深一些，花也大一些。我们去的是锦章照相馆，给我们照相的师傅是个留着大背头的中年人，胡子刮得铁青。他仔细为我们俩摆弄着，也许是因为我们俩穿得很像，背头师傅刚开始以为我们是母女俩，他叫王淑香阿姨坐着，让我站在她前面，后来听见我总叫她姨，便醒悟过来，安排我俩都坐着，让王淑香阿姨把我拥进怀里。背头师傅不断调整相机角度，头上蒙着一块黑布，在里边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拍好照片。

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即使那些心高气傲的美女也不例外。在当时，军人是绝大多数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王淑香阿姨尤甚。我现在依稀还记得那时流传的一些顺口溜，例如：“大皮鞋，噶噶响，最少是个连排长。”上世纪50年代后期，王淑香阿姨如愿嫁给了一名军人。他是原烟台海军炮校的军官，南方人，瘦高个，穿上蓝军装显得十分威武。后来我也成为一名军人的妻子，或多或少是受了她的影响。

上小学后，我家搬离了马连（家）莹。妈妈先后为我添了四个妹妹，人口多了，粮食不够吃，王淑香阿姨常送来食品接济我家。记得有一次，家里做糠窝窝头，实在难以下咽，我便空着肚子上了学，结果饿昏在马路上。王淑香阿姨知道后，便把叔叔从部队食堂买的馒头送到我家。那馒头是长方形的，喧腾腾的，散发出一种带有碱味的浓烈麦香，令我至今难忘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王淑香阿姨随叔叔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。起先我们对她十分担心，人生地不熟，远隔千山万水，条件艰苦，这对从小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她无疑是一个考验。她断断续续给母亲来过几封信，讲她的孩子，讲她在远离喧嚣的边陲小镇的生活。

那时叔叔担任建设兵团某团政委，而她在一个连队当普通职工，他们的任务是种棉花。在她字数不多的信中，说的最多的是她种的棉花。她常常自豪地说，新疆的棉花是世界上最白的，比天上的白云还白，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棉花。让我们安心的是，虽然在信里能读出她的辛苦，但字里行间我们感受更多的是她在逆境中，内心那种强大的调适力和驾驭能力，以及对命运变换的坦然面对与接受。当然，她对第二故乡，对那片充满野性与张力、广袤雄浑的戈壁的热爱更是跃然纸上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王淑香阿姨回烟台治病，住在我家。她铅华尽洗，白皙的脸被大漠的朔风吹成古铜色，但她那乐观率真的性格，依稀还能看到她过去的影子。幸运的是，经毓璜顶医院专家诊断，她患的是甲亢，无需手术，只要按时吃药，注意饮食即可。她挂念家中的孩子，挂念地里的棉花，当天便要走。我母亲说回来一趟不容易，让她与我们全家一起照张相，她频频摆手：“不照喽，不照喽，像个老猴子喽。”那是我们与她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人还是要有一点精神的，只要精神在，无论艰苦或者安逸，其实都不重要。想起王淑香阿姨，还会想起她说的，“新疆的棉花是世界上最白的，比天上的白云还白……”

乔老爷从军记

潘云强

1969年，师通信营来了一个“老”新兵。此人姓乔，毕业于某大学通信专业。说他老，是因为他当时已30虚岁，在地方工作多年，早已超过服役年龄，属于半路当兵。有人说，他给征兵的领导写血书。当然，这只是坊间传说，靠谱的说法是他因文化方面的优势而被特招入伍的。

老乔是天津人，外表却一点不像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。也许天津人骨子里就带着幽默基因，老乔很爱开玩笑，动不动嘴里蹦出一两句冷笑话。那时有个《乔老爷上轿》的电影，就有人送他个乔老爷的外号。

老乔在新兵连期间，就做了一件露脸的事。军通信营有一些通信技术资料和手册，要师通信营派一个懂行的人去拿。当时军部在青岛，而我师在胶南县驻防，领导决定派老乔去。去青岛还有另外一个任务：师通信营有个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关姓教导员，从朝鲜战场归国后，因重病十多年一直在青岛某医院住院，这次顺便让老乔把营里的慰问品给关教导员带过去。营里共批给他二天假，老乔第一天中午从营房出发，先乘汽车，后坐火车。时间很紧，他不敢怠慢，争分夺秒办完事后，第三天坐一大早火车往胶州赶，再转汽车到胶南县。在胶南县下车后，已是上午10时，站内再无发往营房方向的班车。为不影响中午前按时归队，老乔把十多斤重的手册和资料扛在肩上，大步流星来了个急行军，踏进军营大门刚好11时30分，提前半个点。尽管老乔累得像个“皮鸭子”，但却得到干部战士的一致好评。

通信营数电话连最苦，为此，老乔主动要求到电话连，被分到三排一班。在这里，老乔的另一项特长也展示了出来。那时部队有一句话是“解决战斗还得靠最后的二百米真功夫”，意指决定战场胜负最终靠的是贴身的肉搏战。而广泛流传的另一句“任何事情要敢于刺刀见红”，热乎程度不亚于现在的时尚网络用语。这两句话在肯定拼刺刀重要性的同时，更强调的是一种敢于亮剑、一往无前的大无畏战斗精神。

现在的很多影视剧，为渲染战场气氛，拼刺刀的动作往往弄得幅度很大、很夸张。其实，拼刺刀讲究的是“快、准、小、狠”，小恰好指的是动作幅度要小。老乔身高1.83米，个子大，再加上4字口诀领悟得透，拼起刺刀那是相当威武。只要指挥员“预备用枪”中那个枪字的口令一出，老乔双腿后蹬带动腰部力量早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刺出去，把面前的稻草人刺得摇摇晃晃。一堂课下来，等指挥员“枪放下”的口令下达，再看那些稻草人，别人的还是好好的，老乔面前的早已被他刺得稀巴烂。老乔是我们营的拼刺刀状元，那一次，通信营组织各连拼刺刀的优胜者用木头枪进行擂台赛，老乔打败所有对手，荣膺第一。

俗话说：通信兵是部队的千里眼顺风耳，而电话兵最主要的任务是保障全师有线通信的畅通，训练也主要围绕爬电线杆及收放线展开。爬电线杆，强调的是人全身的协调性和灵活性，和那些身轻如燕的战友们比，老乔魁梧的身材相对是个短板，但小鸡不尿尿——各有各的道，首先老乔肯下苦力练，那些手及胳膊上的无数茧子就是明证；其次老乔扬长避短，把身大力不亏的长处发挥到极致，很快，老乔上电线杆不能说是如履平地，起码身上如同带了风，那是嗖嗖的。还有收放线，三四十斤的电话线车，背在肩上，要在规定时间内架设到指定位置，人的奔跑能力是一方面，战斗精神更重要。我记得那次电话兵考核在大雪天进行，老乔那双鞋很新，挤脚。没办法，他就把袜子脱下来，光着脚穿着解放鞋玩命地跑，等完成任务，脚磨出好几个大血泡，头上冒出的汗早已结成了白霜。

由于他表现突出，当兵仅8个月，老乔就被任命为排长。当了干部后，老乔工作更积极了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老乔被调到济南军区，专职搞文化教育工作。

正如老乔临别所言：先学生，后工人，再从军。左走走，右转转，兜转之间，在部队找到了自己想走的人生之路。